

解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自觉性^{*}

张志丹

【内容提要】能否找到一条成功的现代化道路，是关乎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有深刻的历史、现实和理论原因。由先进政党领导、科学理论指导和自主道路支撑构成的“三位一体”，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自觉性的内在逻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自觉性的关键着力点，在于立足政治自觉、理论自觉、实践自觉和文化自觉，坚持人民至上与驾驭资本相结合。新时代新征程，深刻认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自觉性，不仅有利于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而且有利于保持历史主动、历史自信 and 战略定力，从而行稳致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西方现代化 人民至上 资本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区别归结为一点，就是自觉的现代化和自发的现代化的区别。自发的现代化是指以利益为导向，经由经济、技术等要素长期自然演化而渐进累积的现代化，其往往缺乏明确的现代化意识与顶层设计。与之相对，自觉的现代化则是立足本国国情，主动谋划、科学决策和坚定实践的现代化，其从自发探索转向基于自身实际的有目标、有规划的自觉探索。自觉推进现代化，既离不开对人类社会规律、现代化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科学把握，也离不开全面把握和引领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力量。新时代新征程，深刻认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自觉性，不仅有利于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而且有利于保持历史主动、历史自信 and 战略定力，从而行稳致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一、中国现代化必须走自觉性之路的内在原因

西方现代化以其先发优势长期占据全球发展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一套看似自洽的演进逻辑。然而，这种先发优势并不等同于自觉性。我们不能否认西方现代化在某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总体逻辑研究”（23ZDA084）的阶段性成果。

些具体阶段展现出某种自觉性（囿于阶级视野，本质上是消极适应历史规律），但是总体而言，无论西方现代化包含多少自觉性成分，都无法上升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觉高度，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在认识历史规律的基础上，立足自身国情与国际形势开展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正是中国式现代化摆脱跟随、依附与盲从，超越西方现代化，进而迈向自觉现代化的逻辑前提。

1. 历史维度：西方现代化道路不适合中国国情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对世界文明贡献巨大，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但是，近代中国却未能“作并世之先进”，反而被世界现代化浪潮甩在了后面，“落后就要挨打”，由此“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①。在“睁眼看世界”之后，中国人深知自己与西方的差距，无数仁人志士努力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可谓上下求索、历尽艰辛，然而诸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没有止步。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人“以西方为师”追赶世界现代化潮流的道路充满坎坷，甚至出现了“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现象？对此，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②，“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③。就是说，即使我们借助西方现代化的“梯子”试图走富国强兵之路，也是不可能的。

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叠加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外部时局，从内外两方面决定了自发现代化道路行不通。在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不足”而又“后天乏力”，绝不可能担当推进现代化之大任。面对强大的敌人和渺茫的发展机遇，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中国人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④。历史证明，唯有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现代化的正确方向。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无产阶级作为大工业的产物，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新的生产关系，代表着历史前进方向，因而是“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⑤的革命力量，是真正能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党坚持科学理论指导，非常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9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善于把自发性提高到自觉性”^①，自此中华民族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由自发走向自觉。正如马克思所讲：“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②

2. 现实维度：西方现代化道路不适合中国实际

世界现代化发端于西方现代化。西方现代化植根于资本主义制度，在现代化出场时间上具有历史优先性，由此形成了“倒金字塔结构”的政治—经济霸权秩序，且这一秩序不断得到巩固。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赛道”是西方发达国家最先开辟的，“最佳跑道”必定被其牢牢占据。近代以来，世界体系、世界秩序就是“姓资不姓社”，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依靠自身的经济、科技、文化和军事优势，形成和保持对资源出口国与廉价劳动力供给国的剥夺格局。这种格局产生于几百年前，尽管存在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但实质却丝毫未变。这种在萨米尔·阿明提出的“中心—外围”结构之下的零和博弈必定导致几家欢喜几家愁，不可能全球共富，这是由西方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制度属性和生产过程全球化决定的。阿明指出：“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进程并不能结束现存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固有的两极分化趋势；相反，两极分化的形式和机制将被推广到其他地区，在那里，中心区国家的金融、技术和文化以及军事垄断权将控制这些形式和机制，从而使全球化的价值规律的新形式产生新的两极分化。”^③实际上，资本主义现代化率先在原发国家完成阶段性转型，后发国家普遍缺少复刻的时机和条件，即便有所成效也代价沉重、弊病难消。

不难看出，西方让发展中国家接受所谓的“普世价值”搞资本主义制度，目的是搞乱他国、唯我独尊，实际上是典型的“双标式”操作，以维护现有霸权格局。因此，只有立足新时代，科学研判国情，理性选择发展道路，走自信自强的现代化道路，才能避免任由资本摆布的“非自主的现代化”的盲目自发性。这不仅是历史给出的结论，也是现实的需要。

3. 理论维度：西方现代化理论不具有普适性

西方现代化总体上是资本逻辑至上。我们不能说西方现代化毫无自觉性可言，更不能说它毫无理论建树。但是，通过系统爬梳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不难发现，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社会学领域的韦伯—帕森斯理论、经济学领域的罗斯托模型。以韦伯—帕森斯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以欧美发达国家为参照，概括

① 《列宁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2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③ 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对当代社会的管理》，丁开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引言第4页。

出了现代化的标准模式，发展中国家必须首先向西方学习三点：经济上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制度，政治上的多党民主制度与法治制度，思想上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是西方现代化的实践方案。而后，以“欧洲中心论”为代表的现代化话语，主张以现代—落后、文明—野蛮的二元叙事，形成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线性进化逻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叙事被“美国中心论”取代，发达—发展中—欠发达国家叙事大行其道。但实践一再证明，该思想理论体系存在根本性缺陷。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南美诸国（智利、阿根廷、巴西等）经历了起飞阶段之后，反反复复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现代化成为永远难以企及的天花板，曾经在历史上风靡一时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日渐式微。

不可否认，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指导下，资本第一次开辟了世界历史，由此推动了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文明成果。但其在“工具理性膨胀”的基础上发挥的能动性终究有限，正所谓“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①。恩格斯曾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现代化存在巨大的内在悖论：“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②资本主义现代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同时猛烈冲击旧有的生产生活和社会文化体系，造成了传统与现代对立式的断裂。正如马歇尔·伯曼指出的：“它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倒进了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③

正是在西方现代化实践中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化理论，这些理论本质上是西方现代化实践经验、价值立场和霸权叙事的理论概括，生硬移植到他国必然水土不服。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④。因此，我们不能照搬照抄、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搞现代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⑤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7页。

③ 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23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9页。

二、“三位一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自觉性的内在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①由先进政党领导、科学理论指导、自主道路支撑构成的“三位一体”，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自觉性的内在逻辑。三者有机统一、协同发力，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先进政党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

坚持党的领导，是自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前提和根本保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定性的话，是管总、管根本的。为什么要强调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因为，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②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正是人类历史活动走向自觉成为可能，才诞生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也正是这份历史自觉，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活动空间，使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从可能变为现实。

概言之，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目标、动力和力量。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信仰信念、政策主张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否则，中国式现代化就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甚至犯颠覆性错误。

党的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我们党始终坚守初心使命，矢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坚持把远大理想和阶段性目标统一起来，一旦确定目标，就咬定青山不放松，接续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从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一代一代地接力推进，并不断取得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这一领导核心作用，使中国能够连续制定并实施五年规划，确保政策连贯性和执行力，与西方政党因选举博弈导致的政策碎片化形成鲜明对比。

党的领导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以伟大历史主动精神不断推进各领域体制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

^①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31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第73页。

构，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不竭动力源泉。

党的领导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中国式现代化以群众史观为理论基础，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创造精神，汇集全体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①区别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了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逻辑，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现代化的目标。我们党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愿景激励人、鼓舞人、感召人，凝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磅礴伟力。

事实上，我们要把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有机统一起来，锻造一个永远充满朝气、不断自我革命的先进政党，从而使自己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党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唯其如此，才能“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②。从革命对象来说，革命分为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即主观和客观两个维度。一般地说，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是辩证统一、互促共进的。党的自我革命是出发点，伟大社会革命是落脚点，党的自我革命的程度决定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效。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即通过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破解政党治理难题。只要中国共产党不忘本来（初心和使命）、不忘本质（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不忘本色（艰苦奋斗、改革创新的本色），就一定能够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协同并进。

2. 科学理论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遵循

没有科学理论的引领，不可能开辟光明的未来。有无科学理论指导，是判断现代化自觉与否的重要标准，也是决定后发型现代化能否成功的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指导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支撑方面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最大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科学指引。”^③

自主的现代化理论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自觉性的理论保证。如何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呢？我们需要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坚持“两个结合”根本途径，坚定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推进理论创新。在破立并举的辩证逻辑中，既要实现对西方现代化的批判性超越，又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第7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7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第74页。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①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体现了现代化问题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规律，成功超越了“资本总体性膨胀”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彰显了中国自主的现代化知识体系的构建成就。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内容，是其“四梁八柱”，是支撑这套理论体系的内核。

具体来说，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强调“两个文明”协调发展，聚焦于人的全面发展；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毫无疑问，这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反思、批判和超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承载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历史使命。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胸怀天下，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根本超越。

3. 自主道路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道路关乎旗帜和方向，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近代中国遭遇民族危机以来，一系列救亡图存的努力之所以最终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所选择的理论、道路与制度不符合国情。近代中国曾深陷四分五裂、人心涣散、精神沉沦的困境，而今实现了国家统一安定、全民同心聚力、民族自立自强，综合国力日益强盛，国家面貌焕然一新。“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②，同时实现了“两大奇迹”，即“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③。阿明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这一成功的崛起取决于其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世界上许多国家实质上并没有走上真正连贯而独立自主的道路，而是遵从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全球化模式^④。依附性或者跟随性的发展道路不能支撑自觉现代化，只有自主道路才是发展自觉的前提和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主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独立性，即在理论创新上坚持以“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实践探索上始终强调“走自己的路”，拒绝照搬外国模式；坚持中国特色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第70、73页。

②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9页。

③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327页。

④ 参见萨米尔·阿明：《中国在走一条独特的道路》，朱美荣编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2期。

的发展道路，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强调从本国国情出发制定政策，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体现中国发展的实际需求；坚持制度建设的自主性，即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并实现其成功定型，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国际关系中的自主立场，即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捍卫国家主权和自主发展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文明互鉴的开放性，积极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以我为主、守正创新。“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①。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主性体现在理论、实践、制度和国际关系等多个维度。在此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依托的中国式现代化，必定会摒弃西方现代化老路，提出现代化的新理念，展现自主道路的世界意义。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保证其自觉性的强大实践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②

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得通、走得好，关键在于抓住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四大关系”。其一，创造性地推进人类解放与民族解放相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人类解放理论和列宁提出的民族解放理论，是中国式现代化走向自觉的理论基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立足国情进一步实现人类解放与民族解放的统一，其核心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范式。其二，创造性地推进革命与现代化相统一。革命通过变革社会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发展，为现代化开辟道路；现代化则以生产力的持续跃升巩固和深化革命的成果，二者共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其三，创造性地推进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100多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梦想，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两者同向同行、同频共振。其四，创造性地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统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冲击，我们必须坚持守正创新，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制度自信。为此，必须立足本国国情，坚持党的领导、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56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1页。

③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页。

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力量源泉，依法治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障。

总之，在处理好上述关系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各国现代化共性的同时，又在规模、性质、内涵、特征和目标等方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彰显了独立自主基础上的自觉性特质。

4. 三者的辩证关系：相互依存、协同推进

党的领导是核心。党的领导贯穿科学理论指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全过程，通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机制，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正确、行动统一。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党通过理论创新和制度设计，将科学理论转化为道路实践。科学理论是思想灵魂。科学理论既是党的领导的思想武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遵循，同时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践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的领导和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体现，通过具体政策和制度安排，将理论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现实力量。总之，党的领导、科学理论指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支撑，具有“三位一体”的协同效应。党的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科学理论指导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思想武器和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是立足国情的实践路径，塑造了现代化的中国样本。三者共同构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自觉性的“基因密码”，既避免了西方现代化的资本逻辑、两极分化和对外扩张，又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三、人民至上与驾驭资本：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自觉性的关键着力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号召全党做到“三个务必”，“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①。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科学历史认知。要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牢牢把握这种历史主动，就必须深刻洞察现代社会运转的核心机理，将规律性认识转化为处理重大关系的实践智慧。其中，坚持人民至上与驾驭资本便是提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自觉性的关键着力点。人民至上与驾驭资本是自觉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2页。

对突出矛盾，两者辩证统一。能否辩证把握人民至上和有效驾驭资本，直接关系到现代化道路的性质与成败。这既是对中国现代化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资本治理困境的积极回应，更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大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为此，下面立足“四个自觉”来阐发人民至上与驾驭资本的辩证关系。

1. 政治自觉：以党的领导确保人民至上和驾驭资本

所谓政治自觉，是指“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①。其核心在于通过强化党的政治领导力，确保人民至上和驾驭资本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党的领导，将人民至上提升至政治自觉的高度，视其为国家发展的根本价值遵循。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驾驭资本层面，政治自觉要求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强化党的全面领导确立资本服务的正确方向，运用政治力量实现对资本的有效驾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政治灵魂与根本保证，从根本上确保了资本运行的社会主义属性和人民立场。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党对资本治理的政治引领主要体现为四重维度：其一，资本治理方向的根本性。“资本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关键要看体现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掌握在谁的手中，为谁的利益服务”^②。中国共产党始终从政治高度统领资本运行，通过制度建构与价值规范，牢牢把握资本治理的社会主义方向，致力于使资本服务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长远福祉。其二，资本治理领导的一贯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③。党的领导地位奠基于深厚的历史实践与人民支持，这从根本上保障了党在资本治理领域领导的一贯性，即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形势如何复杂，党始终牢牢掌握资本治理的主导权，确保资本治理沿着正确的方向稳步推进。其三，资本治理全局的统筹性。党通过“五年规划”体系、中长期发展战略以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围绕资本治理展开系统且全面的顶层设计与发展引导，将资本治理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的关键位置进行统筹谋划。其四，资本微观治理的引领性。党组织凭借独特的组织优势与政治智慧，通过“嵌入”企业治理结构，在微观层面实现政治功能与资本运行的深度融合。在国有企业中，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2页。

② 张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8期。

③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2页。

核心作用，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①等体制，确保党委领导核心与现代企业制度有机统一。在非公有制领域，党组织通过将“技术骨干培养为党员，将党员培养为骨干”等政治引领与人才建设机制，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克服盲目逐利倾向，促进其合规经营并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由此，党组织在资本治理中发挥政治引导与风险防控功能，体现出党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坚守价值原则的治理艺术。

2. 理论自觉：系统科学地把握人民主体性与资本的工具性

自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认识到现代化中人民主体性和资本的工具性的理论定位。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中，既要明确人民作为现代化实践主体、价值主体、评价主体的核心地位，又要重新厘清资本的功能定位与行为边界，以实现资本健康发展和人民主体性充分彰显。

其一，科学把握人民主体性。人民不仅是现代化的实践主体，依靠人民首创精神突破发展瓶颈；还是价值主体，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导向使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更是评价主体，将人民满意度作为现代化成效的衡量尺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需警惕资本逻辑对人民主体性的侵蚀，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保障政治参与，以收入分配改革优化利益格局，以优质公共服务夯实民生底线，使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始终居于中心位置。其二，科学认识资本的工具性。这要以马克思主义资本二重性理论为基石，揭示其作为手段而非目的的本质规定。资本兼具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自然属性体现为其作为生产要素所具有的组织生产、优化配置、推动创新等功能。基于此，我们可以充分调动资本的创造性活力，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社会属性体现为其背后承载的特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若缺乏有效约束，其内在逐利本性容易催生贫富分化、衍生剥削问题。为此，我们要通过法律规制、政策引导与制度约束，对资本的社会属性予以规范与重塑，使其服务于共同富裕与人民福祉。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我们始终明确资本的工具性定位，即资本是服务于人民福祉与国家战略的手段而非目的。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②。为此，可以在规范与活力的动态平衡中驾驭资本的双重属性，既释放资本的生产要素效能，又防范其对公平的侵蚀，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实践自觉：完善人民至上的治理制度体系以驾驭资本

实践自觉强调自觉地以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并以实践成效反哺理论。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实践自觉聚焦于通过制度建构与执行的协同，达成人民至上与资本效力的辩证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无疑是一种实践形态，其需求源于实践、成就成于实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17页。

践、经验凝于实践。离开实践自觉，制度便沦为空中楼阁。唯有在实践自觉的基础上，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资本治理制度框架的搭建、资本行为边界的划定以及资本治理制度的执行，将“驾驭资本以服务人民”的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安排，才能使资本效力始终服务于人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围绕资本治理需要坚持系统思维与问题导向，逐步构建起以“负面清单—准入清单—监管清单”为核心的三维制度框架，为资本治理提供坚实支撑。负面清单制度恪守“法无禁止即可为”原则，在意识形态、国家安全、基本民生等关键领域设立明确禁区，有效遏制资本过度渗透；准入清单通过技术、环保及社会效益等标准实现“质量筛选”，引导资本有序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数字经济等关键领域；监管清单依托反垄断指数、金融风险预警、社会影响评估等动态监测机制，实现对资本运行全过程的有效预警与实时监管。通过划定资本的行为边界，依法阻断其无序扩张，构成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管理治理机制。在西方现代化的图景中，资本渗透到政治等其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所以马克思将其指称为“一种社会权力”^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若不能有效抑制资本权力的总体化膨胀，则必然偏离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方向。因此，要严格划分资本与政治权力的界限，防范资本的“权力僭越”；要清晰地界定资本与经济权力的作用范围，明确资本与市场权力的本质区别；要厘清资本与文化权力的界限，深刻把握两者在价值逻辑与运行机制上的本质差异。唯有通过制度性安排明确资本运作边界，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增强资本治理的针对性、科学性、有效性，健全事前引导、事中防范、事后监管相衔接的全链条资本治理体系”^②，构建社会生活领域的“防波堤”，才能避免资本逻辑对人文精神的殖民，维护社会生活的自主性与文化生态的多样性。

以严格落实资本治理制度强化资本治理的实效性与权威性。“制度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坚决纠正随意变通、恶意规避、无视制度等现象”^③。确保制度落地生根、发挥实效是资本治理制度运行的关键环节，必须保证制度不被虚置、规避或扭曲，坚决防止出现“纸老虎”“稻草人”现象。为此，应加强制度宣传教育，强化监督问责机制，以此确保资本治理的各项制度安排落到实处、发挥实效。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7页。

② 《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 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人民日报》2022年5月1日。

③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论丛》第2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44页。

4. 文化自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引领资本向善向好

工具理性需要价值理性引领方向，文化自觉旨在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引领资本向善向好，将资本行为纳入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轨道，推动资本运动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向而行。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为对资本冲动的文明化引导，更致力于将资本纳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轨道，实现资本活力与伦理秩序的动态平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①在资本全球化、数字化不断深化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其特有的柔性规范与价值导向，成为抵制资本异化、塑造文明资本形态的关键力量。

其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资本走向人民福祉，为资本立“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共识，为资本活动提供了根本伦理导向。马克思曾深刻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②在资本治理实践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集中彰显于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两个维度，并有效回应无形经济带来的诸多挑战。制度伦理化把公平、正义、诚信等核心价值嵌入法律法规的每一个条款之中，让每一次资本流动都在法治轨道上接受严格的价值检验，确保资本运动不偏离社会正义的航向；伦理制度化则把抽象价值转化为可感知、可考核的具体行为规范，使各种短期逐利冲动在制度红线的刚性约束下消弭，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秩序。

其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契合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资本伦理，为资本赋“德”。诸如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等思想，为当代资本文明化提供了深厚的价值滋养。孟子有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种义利观体现了中华文化对义利关系的高度自觉。同时，传统文化强调“义在利先”“见得思义”，倡导个人获利与社会责任的统一，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须服从人民需要的逻辑高度契合。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训诫升华为现代资本伦理的精神内核，可有效引导资本主体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和责任观。

其三，以新时代企业家精神重塑资本主体性，坚守人民立场，为资本铸“魂”。企业家是开展资本经营、驾驭资本发展的关键行为主体。其精神风貌直接影响资本行为的文明程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企业家精神，敢于闯、大胆干，专心致志做强做优做大企业。”^③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均明确提出

①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6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6页。

③ 习近平：《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求是》2025年第16期。

了“弘扬企业家精神”，强调创新、诚信、爱国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基本导向。企业家精神是强大的企业发展动力，能够有效规约资本片面逐利的冲动，引导企业将资本用于技术创新、员工发展、环境改善和社会公益，从而实现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培育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不仅需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也要加强对企业家群体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企业家将个人成长、企业发展融入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大局，以优良商业文明助推整体社会文明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①立足“两个大局”交织激荡的时代背景，唯有以坚定的历史自信筑牢精神根基，以高度的历史主动把握时代脉搏，方能将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自觉性转化为应对变局、开拓新局的实践伟力。只要我们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紧紧依靠全国各族人民，把握住历史和时代前进的脉搏，不断增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自觉性，就能够历经风雨开辟新境界，战胜挑战赢得未来，把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向前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书写新的时代篇章，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年。
- [2]《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
- [3]侯惠勤：《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1期。
- [4]萨米尔·阿明：《世界规模的积累：欠发达理论批判》，杨明柱、杨光、李宝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 [5]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变化中的世界体系：论后美国时期的地缘政治与地缘文化》，王逢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编辑：张晓敏

^①《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50页。